上篇　社会主义命运的历史反思

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那时,共产主义在欧洲还是一个“幽灵”,一幅“怪影”。然而，科学社会主义一问世，立即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从19世纪下半叶起，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许多国家蓬勃展开。进入20世纪后，社会主义就从一种理想变为一种现实社会制度，曾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一社会制度下，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篇章。

翻开一部人类文明史,我们不难看到,任何一种新社会制度的问世，都不是那么平平稳稳、顺顺当当的，它总要经过许多曲折和磨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战胜外部的敌人，克服自身的弊端，才能使自己不断完善起来，走向成熟，走向未来。社会主义也不例外。150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历经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既有凯歌行进的欢唱，也有失败煎熬的苦痛。这一切，都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历史内涵。如今，当社会主义运动经历着1989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低潮，当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坚定不移地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毅力和勇气，更需要冷静的思索和理性的回顾，从世界历史的方位上来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从中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找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加健康地前进。

一　头脑里设计的新社会

人类社会的希望之光

社会主义就其本义来说，是一种理想社会观。这种社会观的出现，有它历史的现实的原因。

人类社会自从进入文明时代① 以来，生产的规模、组织不断扩大，财富的积累不断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水平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然而，文明时代的社会是在经常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前进和发展的。摩尔根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是由于文明时代增长的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变得迷惘而不知所措所造成的。恩格斯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文明时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大分裂。他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

①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以奴隶制出现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赞同这种划分。

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①

现实社会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缺陷和弊病，当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某一现象表示不满或愤慨时，他的头脑里就升腾起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一束思想火花。只不过大多数人往往被眼前的色彩斑驳、纵横交错的利益、习俗、传统、伦理观念、人际关系等等紧紧地缠绕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的思想往往同当时的社会精神融为一体。他们逃不脱现存社会关系的羁绊，他们不想改变社会的现状，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被捆住了思维的翅膀。然而，历史上总会不时出现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他们要求扫除当前社会和道德的弊病，摈弃旧的传统和宗教，清除那些阻碍时代前进的政治偏见和思想习俗，他们希冀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创造一个新时代。他们总是扮演社会反对派的角色，人数虽少，但思想激进，态度积极，信仰坚定。列宁说过：“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② 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虽与众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在矛盾中前进的必然产物。他们对现存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未来新社会的设计，尽管往往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然而，他们的言行堪称为先知和天才，他们的学说和见解犹如夜空中闪过的一道希望之光。社会愈是黑暗，这道光芒就愈加明亮。

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在古代都先后出现过这样一批怀有崇高理想的思想家。

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就出现过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杰里迈亚等著名的思想家、预言家，他们已经看到，在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377页。

隶制物质繁荣的背后，不公正现象猖獗，穷人受冻挨饿，富人骄奢淫逸,社会不公到处可见,于是,他们呼唤“: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如江滔滚滚”。他们幻想建立一个由正直的国王治理的田园般的城邦国家。在那里，刀剑都铸成犁头，枪械制成镰刀，人类再不会遭受战乱的苦难；盲人将重见光明，聋子将聆听音乐,瘸子将能跳跃,哑巴将会歌唱 自然界也将一片静谧安详：干裂的土地将变成池塘，干渴的田野将水如泉涌。甚至猛兽也变得十分温顺，狮子和毒蛇将成为孩子们的游侣。在古希腊，关于‘ 黄金世界 ’和‘ 幸福岛 ’的传说,以及柏拉图对‘ 理想国 ’的设计，都是出于对现实奴隶制社会中随处可见的贫困、饥饿和沉重不堪的劳动的愤懑，对社会不平现象的控诉。黄金世界的传说，虽然带有美化原始社会的复古主义色调，但它毕竟是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表现。柏拉图作为一名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城邦制度而设计的一套治国理论，主张建立一个至高极乐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没有暴力、没有贫富对立、确立公正原则、实行物质财富的公有制，等等。柏拉图自己承认，这个共和国只存在于人们的推理之中。然而，他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理想世界，使人们看到现实世界的丑恶，激励人们奋起并改造这个世界。

在古代中国，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思想界却出现罕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代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不同学派，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出发，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提出了各自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这种古代理想社会观，在我国通称为‘ 大同世界 ’和‘ 太平世界 ”。其中以孔子对大同世界的描绘最为生动和具体。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 事实上，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往往折射出现实社会的黑暗、严酷和冷漠，这正是古代理想社会观的积极意义所在。

当然，古代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还称不上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它们或带有复古主义的浓重色彩，或浸透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它们离不开时代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制约，目标只能是朦胧的，内容必定是空想的。

对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社会主义思潮最早发源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西欧。学术界普遍认为，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

莫尔生活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英国自玫瑰战争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加快躁动，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加快行进，贩卖黑奴和圈地运动在英国风靡一时。于是，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有所削弱，教士的贪污腐化，贵族和绅士的荒淫无度，国王的暴虐无道，已使社会极度衰败，穷苦人家的境地十分悲惨。另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凭着圈地运动迅速发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破产。

“羊吃人”，这是莫尔对当时英国盛行的圈地运动所作的最生动最深刻的揭露。他在《乌托邦》中说，在这个社会里，绵羊本

① （礼记·礼运》第九。

来是很驯服的，很容易把羊喂饱。可是，羊“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①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初期，养羊以产羊毛，发展毛纺业，就能牟取暴利,于是贵族领主“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逼使佃农的妻儿老少“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背井离乡,到处流浪，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四百多年前莫尔描绘的这幅“羊吃人”的图画，淋漓尽致地勾划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羊吃人”,也成了一句警世名言。

在莫尔生活的年代，人们还看不到资本原始积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所以只能从现象上道德上加以谴责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莫尔着意刻画了一个完美无缺但又无法实现的社会，一个存在于某个乌有之乡的理想社会。在社会大变动时期,《乌托邦》一书中充满了微妙的讽刺,尖锐的批评,明智的建议和智慧的闪光，以及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不仅表现了莫尔惊人的洞察力，而且也是思想史上一颗璀灿明珠。

其一,《乌托邦》所阐述的思想许多方面继承了古代的理想社会观，从思维逻辑到表现形式，都明显地保存着柏拉图《理想国》的痕迹。但是，古代理想社会观只限于揭露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罪恶和弊端，《乌托邦》不但猛烈地抨击封建的权贵和王位，而且已经不自觉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内在矛盾，谴责了这种新的剥削制度同样造成贫富分化和对立，给社会带来祸害。在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弊端,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二,《乌托邦》中要求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文明的理想社会，“乌托邦”遂成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启端。尽管当

①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1 页。

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专用的名词概念尚未诞生，莫尔本人也决不会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然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观，在《乌托邦》中已经有了初步而又清晰的描述 。

其三，《乌托邦》所表现的社会主义观是空想性质的。“乌托邦”产生的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于青春年少时期，它所拥有的经济活力和潜力远未发挥出来，它的政治统治也还没有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还限于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包括早期资产阶级所属的第三等级）的矛盾。莫尔尽管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初期已经暴露的弊端，但现实社会中尚未形成解决这些弊端的力量和手段，因此，只能依靠头脑中的想象来制定未来社会的方案，这种方案注定是空想的。甚至在莫尔之后三百年间，资本主义秩序在欧洲各国相继确立以后，它的弊端进一步暴露，众多思想家提出种种改造社会的方案，往往也都是空想的。所以，“乌托邦”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继莫尔之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绵延不断。

意大利人康帕内拉于 1623 年写出了《太阳城》一书，是这一时期乌托邦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康帕内拉是一位富于理想主义的社会革新家，曾遭受专制政权和宗教法庭的双重迫害，一生中坐牢长达 27 年。就在那最黑暗的年代最黑暗的地牢里，他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一个充满光明、自由、平等的“太阳城”。

在这一时期，英国响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然而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仍是一个暴虐的军事专政，英国人哈林顿的生涯充满着曲折坎坷，驱使他在《大洋国》一书中竭力倡导一个法制的理想社会，他提出了一个能克服混乱状态，又拥有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

随后，启蒙运动在法国蓬勃兴起，处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不但涌现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样一批著名的思想家，而且出现了三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是梅叶、摩莱里和马布利。梅叶在《遗书》中构想了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由公社联盟，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暴君的统治。在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一改从前的乌托邦主义者用文学形式揭露现实和描述未来的创作方法，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并试图使未来社会制度化和法律化。摩莱里在自己的著作里，不但批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政治制度，还批判了启蒙学者提出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理想，这在当时是很不易的。马布利在一系列著作中，拟订了一系列法规和制度，还提出了社会改革的纲领。

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舞台上风潮迭起。各政党、政派、社会集团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运用而引发的产业革命浪潮中，资产阶级给社会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使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黑暗和丑行暴露无遗，使得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潮再度活跃起来。19 世纪初期，乌托邦主义明显地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一是以巴贝夫、卡贝、德萨米、布朗基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潮。

圣西门从青年时期起，就向往自由，积极投身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然而，革命后的法国境况远未实现革命前所预言的建立起一个“理性王国”，现实社会充斥着贫困、暴虐和不平等现象，仍然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理想的破灭，驱使他开展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企图通过一个建设性的、逐渐改造社会的运动，来实现他称之为‘实业制度’的理想社会。傅立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家庭遭到破产，由于他对资

本主义商业的欺诈和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有亲身的体验，触发了他对现存制度和资本主义商业的无情揭露和鞭笞。傅立叶力图发现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他把“情欲引力规律”看作支配全部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规律”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但傅立叶试图寻找社会运动的规律来构架他的理想社会观，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是相当独特的。欧文以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为对象倡导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机器的发明和推广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也带来了可怕的贫穷和苦难。农民、小手工业者无力与大机器生产者竞争而被逼得走投无路，沦落为雇佣劳动者。这支新的劳动力大军与原先的工人互相竞争，加深了社会的灾难。失业人口陡增，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一时。欧文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他尖锐地指出，私有制使世界成为“疯人院”，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面对如此冷酷的社会现实，出身低微的欧文只得以自己的改革实践来展示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先后进行的新拉纳克和美洲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为社会改革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空想共产主义者是活跃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目睹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和产业革命给下层劳动者带来的深重苦难，空想共产主义者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不共戴天的仇敌，主张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理想社会。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用革命手段、包括用少数人密谋的暴力手段去推翻现存制度，建立新社会。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组织”，布朗基的“家族社”“四季社”，堪称为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的先驱，曾多次发动和领导革命运动。巴贝夫、布朗基作为革命家，他们有钢铁一般的革命意志和毅力，

有无与伦比的彻底革命精神。马克思甚至称他们的组织是“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称布朗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当然，空想共产主义者毕竟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懂得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单靠少数人的勇敢和密谋终究是无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

可见,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所以能在19世纪初叶出现并流传开来，首先是基于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空想家们被自己所设计的模糊不清的而又气势磅礴的、完善的社会理想所吸引，并下定决心使理想变为现实，于是他们在不懈追求的同时，还向全世界宣讲这一福音，劝说人们接受他们改造社会的宏伟计划。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这些学派的领导人“全都是富有感染力和极大热情的人。他们无限自信，宁愿今天蒙受冷落和耻辱，以便明天被誉为社会的救星。’①

现实和未来的变奏曲

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一般说来,都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有较清醒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缺点和弊病观察得相当清晰，揭露得十分彻底，他们所追求的未来社会往往也设想得十分具体而周详。这些特点，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对旧制度的声讨,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树立理想社会观的前提和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①史克尔顿：《社会主义：批判性的分析》，波士顿,1911 年,第 1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它还处于成长和发展阶段，远未达到发达和成熟阶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依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它无法摆脱剥削制度固有的种种弊端，尤其在它的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剥削所表现出来的贪婪、野蛮和残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无可比拟的。对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丑恶现象，空想家们观察得如此透彻，揭露得这样淋漓，批判得那样辛辣，是思想史上所罕见的，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拥有巨大思想价值的部分。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圣西门认为“现代的社会真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的写照”①；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中最丑恶的一种”②,雇佣劳动制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工厂是“温和的监狱”；德萨米谴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平等和竞争基础上的私有制,是一种“现代奴隶制”③，它与野蛮时代的奴隶制没有本质的不同，区别仅仅在于它对雇佣奴隶的奴役是隐蔽的，是“用黄金和鲜花把奴役关系掩饰起来”的奴隶制④。

空想社会主义者还着重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原因。一是由于社会上出现“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所有的当权者都是大大小小无能而守旧的游手好闲者,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衡量个人的价值,不是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而是他拥有多少金钱。圣西门讥讽英国人炫耀自己的社会组织，这跟一个患了黄萎病的少女一模一样，这个少女夸

① 《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75 页。
② 《傅立叶选集》第 3 卷,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59 页。
③④ 德萨米:《公有法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01、240 页

耀自己萎黄的脸色，硬说这种肤色是最适宜于妇女的、美丽动人的、健康的标志。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社会陷入全面的混乱。圣西门揭示出，在资本主义下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①；傅立叶首次指出，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②；欧文则认为，科学的发展和机器的推广运用，都直接地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可是由于劳动阶级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导致购买力的缩小，使市场存货过剩，引起各种财富的生产过剩；而危机的爆发，又使劳动者丧失许多就业的机会。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二，私有制是产生财产不平等的根源。

欧文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祸害。他认为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③，它使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变成无知的利己主义者，使富人成为愚昧无知、没有理性的衣冠禽兽；它使私有者喜欢不义行为和压迫别人，使社会经常产生仇视、欺骗和讹诈。欧文还联系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产业革命对私有制进行批判。他在肯定机器大生产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产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机器本可以成为人类最大的福星，在目前的安排下却成了人类最大的灾祸。原因就在于，机器产生了大量财富，却把财富交给了少数人去掌握，“少数人利用这些财富继续吞没多数人的劳动所产生的财富”④。德萨米把私有制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的盒子”，它是产生财产不平等的根源：财产不平等引起社

① 《圣西门选集》上卷，第 75 页。
② 《傅立叶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③《欧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3 页
④《欧文选集》第 1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 259 页

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造成一切弊病、不幸和恶习；私有制造成工商业的垄断和对抗，使社会一片混乱；私有制使人的欲望畸形发展，产生利己主义和勾心斗角，使人变成利己主义欲望的奴隶。魏特林把财产私有制看作是战争的根源，他认为民族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流血冲突,无非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把那最可厌恶的、把人类降低到禽兽的怪物——战争召唤到世界上来。”①

第三，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祸根。

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傅立叶，他熟悉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及其唯利是图的本性，所以他对商业和“商人精神”的批判十分尖锐，毫不留情。他列举了文明制度下商业的 36 种罪恶,其中有囤积居奇、证券投机、高利贷、挑拨离间、对健康的损害、走私、海盗行为，等等，表现为普遍的利己主义。傅立叶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商人精神”把整个社会引向堕落,社会道德也成为商业欺骗的工具。而道德腐化的集中表现是利己主义浸透社会各个领域。他生动地描绘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多患病，律师希望更多的纠纷进行诉讼；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都穿着质量低劣的衣服和鞋子；建筑师希望发生火灾，玻璃匠希望下一场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这一切，都是为了商业的利益。

第四，资产阶级政府是使用暴力和欺骗的政府。

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空想共产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巴贝夫指出，剥削阶级用法律的、经济的、舆论的手段进行统治，当这些手段不足以维持其统治时，就必然诉诸暴力，利用军队来强化其统治，当斗争尖锐化的时刻，资产阶级就

①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84 页。

会投入拿破仑的怀抱，依靠拿破仑来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卡贝认为，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一个作为征服者的贵族阶层在奴役着他们的臣民，因此，目前的一切国家都只是贵族的社会，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都是由贵族和富人制定的，“贵族们本身时刻需要维护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因此便尽力把持一切权力，其中也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结果，贵族阶层的意志就是法律，而且他们行使着绝对的权力,或者说实行专制。’① 卡贝还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军队、警察、民团、法庭、监狱,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布朗基也指出，现存的法国是由议员、法官和士兵三位一体掌握着国家政权,而 3000 万无产者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被排斥于政权之外。他进而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标榜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体，实质上是把三种权力集中在一小撮特权阶级手里，“正是这种三权的混合建立了最残酷的暴政’②。

第五,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欺骗“自由、平等、博爱’是谎言。

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代议制,标榜‘人民主权”,卡贝指出,宪法中规定什么主权属于人民，代议制政府、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企图用这些空话来蒙蔽无知的人们，阻止那些生活犹如牛马的人们起来反抗’③。德萨米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他认为，在没有社会平等的情况下，选举愈扩大，被剥削者身上的锁链就愈沉重。普选制不是什么能铲除社会祸害的灵丹妙药，而是一种可耻的买卖。在竞选时，有人千百次地去和无产者握手，向无产者滥施最诱人

① 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 2、3卷,商务印书馆 1978 版,第 26 页。

② 《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第 7 页。

③ 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 2、3卷,第 26 页。

的诺言。这些假仁假义的朋友，一旦当选以后，就完全抛弃自己在讲坛上许下的诺言和保证，和旧日的统治者勾结起来，共同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

对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布朗基作了最为淋漓尽致的批判。他指出，这一口号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变成众所周知的谎言”，成了“歌剧中虚饰的舞台布景”。布朗基说：“当人们缺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当豪富并列在贫困旁边制造丑事的时候，就没有平等。当女工领着自己饥饿的孩子沿着豪华的宅第乞怜的时候，就没有博爱。”①

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病，激发空想社会主义者去寻找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声讨，也是为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寻找依据。从莫尔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从巴贝夫到布朗基、魏特林，他们都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目标和模式，尽管他们各人对未来社会的设计存在着许多差异，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也有不同，但他们要求摆脱剥削、消除人间的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富足的、和谐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社会观，却是相同的。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不乏天才的预测和闪光的思想珠玑，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学说是唯心的、空想的、无法实现的。

第一，“黄金时代”不属于过去，而属于将来。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怀着对“黄金时代”、“大同世界”的憧憬和追求。可是，“黄金时代”是否已经降临过人间？不少思想家，包括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等人认为，远古时代即原始社会曾经有过一个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他们看来，未

① 《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6 页。

来社会只要回复到人类的原始状态“黄金时代”又会重新到来。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抛弃了这种看法，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递进过程，并力图从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圣西门认为人类在“开化时期”茹毛饮血，穴居野处，没有文化，没有宗教，那时不是什么文明社会，更不是黄金时代。因此，黄金时代不属于过去，而属于将来。傅立叶更加明确地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他说，原始制度和蒙昧制度下不存在“真正的生产活动”，宗法制度下是“小规模生产”，野蛮制度下是“中等生产”，文明制度下是“大规模生产”。欧文甚至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新奇的生产力”“力量无限的新生产力”，认为这是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理性制度“这一伟大的改革时期即将到来的标志”①。以生产力的新发展来论证新旧社会的交替，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独到之处，这同他本人曾经经营过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也可以看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已开始用物质生产和生活状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具有初步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

在圣西门设计的未来社会“实业制度”中，科学(知识)和实业（工业）构成新社会的两大支柱，是组织新社会的主要内容。他主张，在未来社会里，精神权力即领导科学、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的权力由学者掌握；世俗权力即领导行政、生产、经济、财政方面的权力由实业家掌握。国家权力将要消亡，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圣西门重视科学和工业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意味着他主张的未来社会是应当建立在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这一见解是相当精辟的。

①《欧文选集》下卷，第 5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